

比较文明视野下的“起源”问题——引言



颜 荻

(清华大学新雅书院)



王铭铭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人从何而来？世界的起源是怎样的？诸如此类的问题不仅自远古时代便回响于各文明深处，时至今日，也继续深刻影响着我们对自身以及对世界的理解。

从个体层面上讲，起源是一个生命的诞生，是它“来到-世界-之中”的过程。这天然是一个存在论难题，从“不存在”到“存在”，生命只有经历一次谜一般的突破性跨越，才能从空洞的无变为实存的有。从世界或宇宙层面上讲，起源问题则变得更为复杂，因为，于此，从无到有的跨越，不止于个体性，它变成了宇宙之为宇宙本身的事件。不过，无论是个体生命，还是宇宙整体，在起源的认知和解释上都会面临一系列问题：生成的“根”在哪里？是谁或什么东西给予了生命？有谁或什么东西在形塑生命与宇宙最初的样貌？起源究竟是自为的，还是受外力推动，存在先验或先在动力的？

的确，起源本身是晦涩的，它如此古远，以至于难以确知，甚或追寻。

然而作为自我体察与自我认识的根基，这关乎生命与世界本质的发问却总促逼着世人一再向它投去探索的目光。即便那里只是一片神秘与幽暗，人们也希望，哪怕透过微光，也要去窥见真容。

这或许是生命的本能，因此，对起源的追问自人之起源时刻起便从不曾被放弃过。不过，这也意味着，对起源的理解必然富于想象，而在不同文明的图景中，那些想象又被绘制出了不同的色彩，呈现出不同的回应：有的将人或世界的创生诉诸全能的神明；有的将其追溯至不可分辨的混沌；有的将其理解为自然之力的推动；也有的将其彻底神秘化，天道不可与凡人言之。而正是在这些不同甚至充满张力的解释中，我们看到了不同文明对生命、世界、宇宙的多样理解。

作为“华夏与欧亚诸文明”专栏第三期，本辑就聚焦于起源问题，考察诸文明在其“起源”时期对此问题的不同思索。

收录于此的五篇文章,涉及苏美尔、古希腊、古代中国、古代日本以及古代阿尔泰语系诸族等多个文明体,它们分别从不同层面与侧面进行了个案化的剖析,展现了各个文明对“起源”问题的理解与解释。正如过往的两期那样,我们仍希望通过考察诸文明的差异与关联,把握诸文明的生命脉搏,从而实现“文化自觉”。与此同时,在远离起源时刻的今天,我们也不妨带有古今比较的视野,在漫长的人类历史生命的进程中,回望人类初生的时刻。

就起源问题而言,人类最关心的,自然是关乎人类自身的起源,这也是本辑所要集中探讨的重点。五篇文章所论及的具体案例都将围绕这一话题展开,我们将看到:苏美尔人如何理解文明起源与人类诞生的关系(贾妍《泥舟入海:埃利都史前“艺术”与苏美尔文明源起初探》);古希腊人如何想象希腊的先祖从石头而生(颜荻《洪水之后:丢卡利翁起源神话与西方大洪水传统》);阿尔泰语系诸族神话如何在文化传播的体系中重构洪水故事与人类的再生(钟融冰《阿尔泰语系诸族的起源神话及其思想史研究意义》);古代日本如何将最初的人类、诸神与国土叙说为草生之物,而后又再创新的人类(罗宇《“草生人”神话与日本国家的诞生》);以及古代中国如何针对先祖禹生石纽的起源进行叙事的想象与构造(杜美娟/刘宗迪《“禹兴西羌”说考辩》)。

五篇文章所采取的研究方法与视角各有不同,但它们的共同关注都围绕人类起源这一根本问题展开。在考察各文明想象人如何“来到-世界之中”的命题时,不可避免地,所有的研究都延展至了“人类”之外,将问题向社会、国家、天地、神明、世界与宇宙敞开,并将人类的起源追溯至人类存在之前。这一超人的时空架构将为我们理解起源问题提供更加深刻而广阔的视

野,我们将看到,人类的起源问题不仅关乎人对自我生命的理解,它更有关人如何在此之中认识人自身与社会、世界乃至宇宙的关系,从而,理解社会共同体与国家构成的基础、人在天地之间的位置,以及宇宙、神明与人类之间在存在论、宇宙论、神议论以及伦理等各个层面上错综复杂的关系。

在本辑所涉及的讨论中,苏美尔的起源想象可谓最为古远,从史前时代的艺术中就已初现端倪。这一古老的文明自其诞生之初,便将人类、人类文明的起源与世界的整体生命关联在一起。正如贾妍所分析的,人与大地有着十分相似的起源:他们都由水土交融而成,神明取土为质,再以水赋形,万物与文明从此以大地为根,人类也由此形神具备存在于世间。人与世界的同质性,使得水与土(泥)构成苏美尔文明世界本源的同时也构成了苏美尔人对人类自身本质的理解,人类的成长因而也自然与文明的发展相勾连。而有趣的是,在苏美尔人看来,与水土相对的,是一片虚无的大海,它本飘摇不定、无根无垠,全靠神明恩基(Enki)所赐,世界与人类才获得了稳固的根基。在这飘渺与锚定之间,世界文明与人类的起源都被植根于神明行动之中,世界的有无全不由人或自然所决定,正如人的有无全不由自身所决定。苏美尔神话提醒人们不要忘记,人最初的诞生是为了神明对劳役的需求,因此,那创生本身并不具有自我立法的性质,除非,智慧的神明为其赋予质与义,就如同他们为世界在那浩瀚的大海中生造出大地之根。神明,因此,在苏美尔人起源的想象中,成为了人类世界更本质的规定性,而由此,人神之间秩序建立了起来,从而,苏美尔文明笼罩于神圣世界之中。

与苏美尔的起源想象不同,古希腊的起源故事尽管同样在人神框架中进行,但古希腊人

认为,人类的创生恰恰是使人类独立于神圣世界而存在的界标。在颜荻的研究中,我们将看到,古希腊人将自己的祖先想象为“石生人”,而恰恰是这一事件奠定了人与神有序但又分离的关系。“石生人”发生在宙斯因人类僭越而发起洪水惩罚之后,与希伯来“诺亚方舟”的洪水故事颇为相似。然而,不同的却是,在希腊的叙述里,洪水之后,万物俱毁,后代无存,幸存下来的仅是一对夫妻,因此,他们必须重造人类才能恢复往昔的繁荣。在宙斯的旨意下,夫妻二人蒙上双眼,从大地捡起石头向后抛出,石头落地成人。颜荻认为,“石生人”作为人类创生的一种方式,其本质是修正了人类对神明的僭越,重新建立了以虔敬为基础的人神关系,同时,通过将“人的行动”呈现为宇宙秩序、人神秩序重建中的重要一环,该神话便赋予了“人”以宇宙论与神议论的意义。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于苏美尔的水土造人,古希腊的“石生人”神话所叙述的是“二次创生”,这意味着它是对人类“前起源”的一次有意识的修正。该文特别指出,这一“二次创生”是真正将希腊人构建为希腊民族的一次起源,通过区别于“史前的泛人类”,希腊的祖先被赋予了更加神圣与正义的光辉,从而,希腊人得以在人与神和谐共处的天人关系中,将自己宣称为最优秀的民族。

同样涉及二次创生或二次起源的,还有阿尔泰语系诸族与古代日本的起源神话。在钟融冰的分析中,阿尔泰语系诸族形成了一个与欧亚地区相互融合与渗透的北疆文化圈,其口头文学与神话故事深受欧亚文化影响,但同时,在知识精英对欧亚神话的改编与再创作中,又形成了自身的文化传统与民族传统。在起源问题上,阿尔泰语系诸族大量吸收了欧亚的起源叙事,因此,我们将会看到,该文化圈的起源想象与古希腊、希伯来的“洪水与再生”神话多有共通之处,他们

也将其民族的起源置于像希腊“石生人”一样的“大洪水”的故事框架中加以解释。不过,钟融冰指出,与欧亚大洪水传统不同,阿尔泰语系诸族的叙事并没有将重点放在洪水所导致的灾难与浩劫上,他们的“洪水-人类再生”神话并不重视神人关系中的堕落-惩罚机制,较少对人神关系的张力进行深入探索,而是强调洪水之后天神拯救的善举,从而,阿尔泰语系诸族的神话叙事显现出与欧亚文化在天人关系、人类道德谱系以及人类起源/再起源问题上的不同思考。究其根源,钟融冰认为,两者的差异由北疆文化圈自身的地方宗教信仰及其对天人关系的认识所导致,由于该文化以原始萨满教信仰为基础并且追求天人合一的理想,因此,即便在复刻欧亚传统的大洪水起源叙事时,也产生了不同于欧亚传统的人神关系的理解。

相较而言,日本有关人类创生与二次创生神话也受到了一定的欧亚传统的影响,但它更有其自身的构成逻辑,并同时纳入其对中国文明思想的化用。根据罗宇的研究,在日本的原始神话中,描绘了人由草而生的自然起源方式,而“草生人”正可谓日本语境中的“史前泛人类”时期。在这一阶段,草生之人就像草生的高天原诸神以及最初的国土“苇原中国”那样,都经历了“泥土-草芽-具身成人/神/地”的过程,因而,由草而生贯通了人类、诸神和国土的起源,使人类自然成为世界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过,在此阶段,由于人类与神明起源的相似性,人神之界并未确然确立,人类文明也尚处未开化阶段,而恰因如此,日本在其著名的死亡起源神话中出现了人类二次创生的故事,以生死之别定义“新人类”,从而“人草”开化为“真正之人”,在人神之别的基础上,实现高天原众神对人类的统治。罗宇认为,尽管在日本,也存在欧亚传统中的大洪水神话变体,但从对日本文化的塑造而言,其

重要性远不如日本自身所生发的二次创生故事。这是因为，该故事通过强调天神的意志，还为日本天孙降临、让国神话做好了理论上的铺垫，从而，为日本国家的起源叙事及其政治性意识形态建构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日本的起源神话有着突出的政治性神话特征，这一特点也适用于中国。在中国的起源神话体系中，大禹治水的故事同样与前述几个文明的洪水故事多有照应，其叙事也包含了洪水之灾以及灾后重建。不过，不同的是，大禹的洪水故事更多集中在了人类自身的智慧与功绩之上，尤其，通过大禹对鲧治水失败经验的吸取与改良，这位起源时代的先祖被塑造为一位受人敬仰的政治英雄。由此，可以理解，大禹之起源对于炎黄后代而言意义十分重大，其智慧与德性可谓奠定中国国民品性的根基。杜美娟与刘宗迪的研究便聚焦于对大禹起源的讨论。而二位学者提出一个十分有趣的问题：禹作为夏主，其考古文物均在中原，但在神话传说中，禹的出生地却在四川，考古与传说的差异便引人追问，“禹出四川”之说究竟从何而来，其真实性又究竟如何？针对此问题，该文通过对“禹出四川”的历史本相追索，整理出一条从“禹兴西羌”到“禹生石纽”最终到“禹生于蜀”的起源话语线索，从而提出，“禹出四川”为层累造成的传说，并非历史的事实。在杜美娟与刘宗迪的考证中，我们看到大禹起源说与历史中族群迁移、文化建构、政治融合等多重互动，其整体过程呈现出一个有意识的、多层面的对历史记忆与神话叙事的重塑。这一重塑表明，中国的起源神话，如同前述几个文明神话一样，也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变化的场域，人们恰恰通过对其起源的不断重塑，得以构建自身的文明身份，并在其源头处为自身文明的特质奠定根本的基础。

从以上五篇文章我们看到，远古时期，各文

明对其起源的理解与想象各有其色彩与样貌，它们所形成的不同叙事都带有各自文明鲜明的特征与底色。但反过来讲，这些思想又有诸多相通之处：无论是地生、石生还是草生，它们都与自然和大地紧密相连，在对人类与自然关系的理解中，构建了最初对人类生命的理解。与此同时，这些叙说也都不约而同地纳入神明或天的维度，将人类放诸天地之间、宇宙神人之间，从而形成人对自我在宇宙中所处位置以及处境的觉知。就此而言，正如前文所论，起源问题绝不只是有关人类物理性生命来源的理解，而是，它触及人之为人生命的本质以及对“人-在-宇宙之中”这一宏大图景的根本认识。从贾妍笔下的苏美尔，经由颜荻笔下的古希腊、钟融冰笔下的北疆以及罗宇笔下的日本，最终来到杜美娟与刘宗迪笔下的中国，我们在起源问题中看到一个立体的对人类起源的想象，它们之间或相通、或相异、或借用、或影响，正是这所有的叙事共同构成了一个错综交织又彼此牵连的思想网络。我们的跨文明比较也由此得以漫游于诸目的地之间，在这一次次跨越、往返与来复的旅程中，一个多元的文明世界向我们徐徐展开了，而在此期间，我们又不断地回到我们自身之中。